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贡华南:《北宋生活世界与饮酒精神的多重变奏》　指出大宋开国近百年时间里,天下学校废顿,儒释道的创造力萎靡,饮酒担当起为众生提供生存理由与动力的重任。太祖开始,皇帝每日带头宴饮。国家为宴饮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于是百官乐此不疲,士大夫积极参与,整个大宋掀起了狂热的饮酒之风。酒榷制度、引导饮酒消费政令等措施推动了大宋的社会经济繁荣。长期宴饮也推进了对酒的理论思考,饮酒人之常情、人生不饮何为、酒味多于泪等深沉的哲思标志着大宋酒精神的深度,《酒经》等大量理论性著作的出现则表明对酒已经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百年浮华宴饮生活带来人欲的放纵与心灵的堕落等精神难题,这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刺激。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胡晓明:《一个人的百年史——略论王元化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原因》　指出王元化先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极富于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体现在学术与思想、理性的规范性与有限性、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以及五四与后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两面、“人民”的歧义、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的两难性、中国传统的黑暗与光明等方面。内在紧张,一方面是时代赋予思想者的特色;另一方面,内在紧张及其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时代思想探索的潜能。至于其中的原因,黑格尔式的思维训练、学术渊源的多重背景与资源是主要方面。他是党内少有的兼有传统国学、俄苏文学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想背景(追随顾准与孙冶方)以及欧美日本汉学因缘的理论工作者。此外,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自由精神也是一个原因。他说他是永远的单干户,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加入合作社,就是为了保持思想上的内在张力与人格上的独立自由。但除此之外,可以再提出一个理由,即每个重要的思想者,其实都是时代的大脑与良知。王元化先生的思维特质跟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的百年史,即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复杂地理解 20 世纪中国。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4 期　曹虹:《晚清人的域外游记》　指出清代前中期游记撰著中,已开始出现域外游历与知见视野空前广泛的“海事”之书,但直到晚清,才迎来官方或私人海外游历活动的剧增,并促成域外游记的持续涌现。晚清人的域外游记作为知识谱系积累和主题格局拓展,表现出由浅趋深的过程。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作者中,与桐城派文脉关联的作家,一时颇居担纲之任,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对推动游记文学向近代新变的成就令人瞩目,值得强调。在晚清域外游记尾声中,亦显示此体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与审美力量。

武汉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李建中:《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　指出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论在其滥觞处与经学同体同构,经学范式建构起中国文论的信仰、观念、谱系、路径、规则、方法和范例。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借用《文心雕龙》的关键词来表述,其要旨有四:一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话语行为,二是“弥纶群言,笼圈条贯”的阐释路径,三是“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的基本规则,四是“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的核心理念。诠解并通变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不仅可以重塑三千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灵魂与体貌,亦能重建 21 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图谱与话语体系,从而有效回应“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视域中的“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5 期　杨柏岭:《郑文焯的幕客生涯及其词的艺术呈现》　指出郑文焯居吴下近 40 年,入幕 30 余年。幕客生涯以一种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影响着郑文焯的词心,熏染着他的艺术旨趣。其词少见与府主交游词作,多见与非府主的仕宦交游词,偶涉官场生活或官署环境,亦多是旁观者的视角。落南之后,吴中胜景渐次成为他内敛凄异的审美对象,印证着他清独尤宜的审美方式,以及夜泛侵晓的审美偏好。自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年间的一系列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亦是他感喟的突出对象。他尤其擅长以幕客既入且出的生活态度、隐者的旁观视角审视时局,发抒时事变更、身世浮沉之感。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蒋重跃:《超越学科畛域 底止知识创新——从“学术本质”的范畴看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　指出对学术期刊作出评价其实就是对学术期刊的本质加以揭示。事物有多重本质,而揭示不同的本质,就需要相应的不同范畴或角度,评价学术期刊也是如此。目前通行的学术期刊评价是从“影响力”这个范畴或角度来进行的,这样做有可能忽视了“学术”这个范畴或角度。相比而言,“影响力”评价在可操作性上显然占有优势,况且其中也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学术本质的因素;但它毕竟不是学术本质本身。过于依赖影响力评价,对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必然产生不良后果。“学术本质”看起来玄虚,可是在思想上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学术本质要求学术研究和期刊工作都要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问题为导向,就一定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知识创新恰恰就在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工

作中得以实现。学术本质要求学术期刊要与学术研究保持一致,它的工作目标不是固守某一学科,而是根据客观发展的需要,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创新成果顺利发表作出最大的贡献。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5 期　钱乘旦:《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哲学思考》　指出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河南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姬建敏:《阙道隆的编辑学研究及其贡献》　指出阙道隆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和编辑学家,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编辑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人之一。他编辑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为对编辑学概念、范畴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对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他的扛鼎之作《编辑学理论纲要》,首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编辑学理论框架,在编辑学研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标志性意义。他的编辑学研究还具有鲜明的学科建设思想,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价值取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 期　陈元锋:《论宋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指出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苏州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5 期　李德辉:《唐代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　指出唐代以刺史治州郡,大批文学家出任刺史,在任期间不仅政治上有建树,文学上也有业绩,从而在刺史和州郡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但因州郡有不同的层级,刺史的文学水平也有高低,因而二者的结合有不同的表现。对于那些有名的州郡,其关系体现在刺史诗文能够增强名郡的文化吸引力。对于那些普通州郡,其关系在于造就名家,兴建楼阁,带动创作。对于那些无名州郡,其关系是因名人刺郡而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当地人才成长和文学发展。对这些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认识文学家和地域的复杂关系,考察作家创作和地域的结合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重庆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刘志彪、凌永辉:《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亟需从过去那种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即在扩大内需条件下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中国进行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在于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增加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把全球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全球创新链。这需要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其具体政策取向包括坚决激活和维护市场主体活力、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更加重视和强调对内开放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金成晓、李梦嘉:《金融周期状态识别、双支柱政策调控与产出响应》　中国经济在结构优化、方式转变与质量效益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增速减缓风险,双支柱政策在调控金融周期波动过程中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向影响值得关注。文章在构建金融状况指数的基础上,对金融周期状态进行了识别,并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周期处于不同状态时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处于不同状态时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以流动性比例监管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工具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高涨期促进产出增长效果明显,但与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工具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紧缩期促进产出增长效果更明显。因此,在制定与实施双支柱调控政策前,应全面做好政策效果评估,充分考虑所处金融周期状态与经济周期状态,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朱大旗、曹阳:《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纳税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随着纳税人

信息权及其法律保护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有很多围绕其展开的问题亟待厘清。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不但得到大数据背景下税收治理信息化实践需要的有力支持,而且也与纳税人权利保护思潮、个人信息权/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立法潮流叠相促进。考察我国对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历程及现状,不难发现,我国在对纳税人信息权实施法律保护过程中,仍存在相关立法位阶不高、抵牾冲突规定较多、责任追究薄弱、救济途径和衔接机制不畅、涉税信息处理与分层保护规定存在空白瑕疵等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立法、税务执法及司法、纳税人等维度对我国纳税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加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顺利实现。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　指出 2020 年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减贫事业的终结,相对贫困问题还会长期存在,并将成为未来减贫的重要内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反映贫困程度的一组概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共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绝对贫困侧重生存所需,具有绝对性和客观性;相对贫困侧重机会缺失、权利剥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长期性和动态性。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经历“保生存-保生存与促发展-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全面小康”五个阶段。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明显,未来贫困治理需要确定合适的相对贫困标准、实施针对低收入群体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扶贫体制、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以缓解农村地区、城乡、区域之间的相对贫困状况。

邯郸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2 期　康香阁、贾建钢:《荀子的“王道”观念》　指出在先秦的各思想流派中,“王道”和“霸道”之辩是人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孔子主张王道,但他对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道观念又有正面的评价;孟子则明确提出了崇王道黜霸道的观念;荀子对王霸之辩的主张较为复杂。荀子认为王道无疑是最高的理想,但他对霸道却没有像孟子那样持论决绝,而是提出了“信立而霸”的思想。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荀子霸道思想,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较少。实际上,“王道”思想才是荀子政治理想的核心。荀子对于国家治理提出了三种方式:“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即王道、霸道和亡道。选择不同的治国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荀子将王道规定为“义立而王”。所谓“义”是治理国家的原则、标准或准则。“义”在《荀子》一书中内涵丰富,与礼并用,为“礼义”;与仁并用,为“仁义”。在荀子看来,统一天下之道在于王道,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礼义为最重要的内容。君王选择王道,立国措施皆必须以礼义为标准。而对于君王和各级官僚,也必须以礼义约束自己,做好表率的作用。王道的实现在荀子那里必须仰赖仁人、明主,社会的突出的特点是人主与百姓的关系和谐融一。“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这可以理解为“义立而王”王道社会,在“义道”落实而后有的理想图景。当然,荀子言“义”在理想的一面之外,也有现实的规定:“义”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分”而使人群处于“群居和一”的状态,社会即处于正理平治,而这就是荀子所向往的王道之治。

石河子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郭院林:《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 前〈楚辞〉时代屈原赋的传播、诠释与接受》　指出长期以来,屈原赋成为聚讼之的,关于作者、作品真伪争论不休。回到历史场域,坐实早期屈赋接受史,有利于避免在原始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各说各话,臆测推论。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界定概念,正本清源,从最初楚文化的政治影响以及刘安、司马迁对屈赋人、文不同侧重关注与诠释内容,讨论屈赋传播所反映的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依据史料,人们可以肯定刘安为《离骚》作传,但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离骚序》是“以意逆志”,为我所用,完全是道家的内涵。司马迁以文传人,做到了“知人论世”。但与其说他是在写史,不如说他在诠释屈赋。诠释过程中挖掘屈原非儒非道的“怨愤”态度,是对人生的质疑,也是司马迁独立思考与个性体现。虽然他们的诠释存在不足,但与大汉帝国秩序密切相关,他们开启了后世屈赋(包括《楚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马焱:《家庭家教家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视角——兼论新时代妇联组织的家庭工作》　指出家庭是每个个体价值观形成以及个体完成社会化进程的重要起点,也是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家庭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又是主要治理对象;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段,又是目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与家庭功能相融相嵌。家教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够依托的重要教化途径。家风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够依托的精神力量。妇联组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通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方法,尤其在 2020 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开创性地探索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为日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